APEC「中國年」的大灣區答卷

柳凡 | 議事論事

亞太經合組織第33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在深圳拉開帷幕。這是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主題定為「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三大優先領域聚焦「開放、創新、合作」。值此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地緣博弈加劇之際，亞太各方對深圳峰會寄予厚望。而回望一個月前，香港首次承辦APEC財政部長會議並圓滿落幕，深港以協同姿態，為「中國年」寫下極具大灣區特色的註腳。

深圳峰會的分量，首先在於它承載着亞太各方對「重回增長軌道」的集體期待。當前世界經濟復甦動能不足，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供應鏈重構壓力持續向亞太傳導。越是在這樣的時刻，各方越需要一個能夠坐下來談合作、談規則、談共贏的平台。中國將「開放」置於三大優先領域之首，並非簡單的口號宣示，而是對區域現實需求的直接回應。改革開放四十餘年，深圳從邊陲小鎮成長為全球創新高地，本身就是「開放帶來繁榮」最生動的案例。

「開放亞太」的實踐註腳

選擇深圳作為領導人會議舉辦地，等於把一個關於開放的「活樣本」擺在與會者面前。這裏有全球最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有活躍的風險投資生態，有連接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港口與口岸。當各方代表在這座城市討論亞太自貿區、數字經濟與供應鏈韌性時，他們看到的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座城市如何在開放中完成產業躍遷的真實路徑。這種「可觸摸的開放經驗」，比任何文本談判都更具說服力，也讓中方倡導的「開放亞太」有了堅實的實踐註腳。

香港在此次APEC「中國年」中的角色，值得大書一筆。十月在香港舉行的APEC財長會，是香港歷史上首次承辦這一級別的相關會議，行政長官李家超形容為「歷史性時刻」，直言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信任與國際社會對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肯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會上披露的一組數據頗具說服力：香港今年首八個月商品出口貨值上升逾四成，約七成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來自人工智能相關企業。這說明香港的金融發展正與亞太科創需求深度對接。財長會通過的相關文件，亦非空談，而是將香港在綠色金融、數字資產與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轉化為區域公共產品。從維港到深圳灣，香港以「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的雙重身份，為領導人會議作了扎實的議程鋪墊與共識預熱。

深港聯動所揭示的，是一種不同於傳統辦會邏輯的區域協同範式。以往APEC會議多集中於單一城市，而此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財長會在香港，兩座大灣區核心城市在不足兩個月內接力擔綱。新皇崗口岸專設的「紫色禮遇通道」，讓持APEC商務旅行卡者一分鐘通關往返港深；與會代表在香港科學園、數碼港與西九文化區之間穿梭，看到的不只是會展中心的議程，更是大灣區從創科前沿到文化軟實力的完整肌理。這種安排絕非偶然。深圳的產業轉化能力與香港的基礎科研、金融支持形成互補。當APEC的政商領袖親身走過這條動線，他們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解，便不再停留於新聞，而有了切身的體驗。

形成若干可操作共識框架

當然，機遇之下亦有緊迫感。工商領導人峰會以「共促繁榮，共贏未來」為主題，設置亞太自貿區、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七個議題。人工智能無疑將是深圳會場最熱的關鍵詞之一。香港今年在AI相關IPO上的亮眼表現，與深圳作為電子製造與智能硬件重鎮的地位，恰好構成從資本到應用的完整鏈條。但也要看到，亞太各方在AI治理規則、數據跨境流動、技術標準互認上仍存在顯著分歧。若能在這些「硬骨頭」上形成若干可操作的共識框架，其意義將遠超一場例行峰會。有外國媒體在會前評論中的期待頗具代表性：一個主要經濟體之間雖競爭但持續貿易、技術可在明確規則下跨境流動的區域，符合包括中亞國家在內的廣泛利益。

APEC從來不是解決所有分歧的場所，但它提供了一個讓各方坐下來談具體合作的空間。中國作為東道主展現的是一條務實路徑。先在有共識的領域做成事，再以成果倒逼更大範圍的合作。當亞太數十億人口的市場面臨供應鏈重構與技術變革的雙重衝擊，深圳灣畔的這幾天，或許不會立刻給出所有答案，但至少能讓各方重新確認一個樸素的道理，即繁榮從來不是零和博弈的產物，它誕生於港口之間的貨輪、實驗室裏的聯合攻關，以及談判桌上即便艱難卻從未中斷的對話。大灣區已經搭好了台，接下來看如何推動共識的達成。

法智匯大灣 數據通北都

何建宗 肖加升 | 議論風生

本月香港法律周2026成功舉辦了以「法智灣區 匯雋融通」為主題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論壇，凝聚三地法律智慧，共同刻畫法律界透過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宏偉藍圖。誠如律政司司長在致辭中所指，大灣區具備「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色，擁有雙重執業資格的大灣區律師正是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優勢的領航人。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數據已被正式定性為第五大生產要素與核心數據資產。隨着中資企業加速「出海」拓展國際版圖，跨境數據合規已成為企業面臨的最核心問題之一。

中美歐政策導向截然不同

在全球數字經濟與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大背景下，中美歐在數據跨境流動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監管格局，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導向。

中國模式始終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以事前風險防控為核心理念。依據《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核心法律框架，中國明確了數據出境的三條法定路徑：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備案，以及個人信息保護認證。其中，安全評估主要針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及處理海量個人信息的主體；標準合同與保護認證則為一般企業及跨國集團內部數據流轉提供了標準化、便利化的合規通道。這種「1+3+N」的體系既構築了堅實的國家安全防線，又為企業提供了明晰的合規指引。

相比之下，歐盟模式代表了目前全球最嚴苛的數據合規標準，企業往往面臨非常高的合規成本。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歐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為核心，歐盟主要透過三類機制實現個人數據轉移：充分性認定（Adequacy Decision）、標準合同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和約束性公司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其中，SCC是目前最常用的法律工具，而歐盟對數據接收國的保護水平要求極為嚴苛，任何未獲充分性認定的國家或地區在接收數據時均需面臨繁複的合規審查。

美國模式則展現出較強的規則彈性與防禦性，且缺乏統一的聯邦數據跨境機制。當前，美國呈現出聯邦行政令與州級立法並行的雙層監管架構。在聯邦層面，美國透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加強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審查框架，並透過《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限制關鍵技術出口。拜登政府先後發布的EO 14110（關注安全、可靠和可信人工智能）與EO 14176（限制受關注國家獲取美國敏感數據），進一步將數據控制權與國家敏感基礎設施緊密綁定，對中資AI企業影響尤為顯著。在州級層面，則以《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及其後續修訂的《加州隱私權法案》（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ct, CPRA）等嚴厲的隱私立法為代表，形成了嚴密的數據保護網。

直面挑戰築牢數據安全防線

當前大灣區在探索數據跨境便利化方面已取得實質性進展。依託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大灣區內地與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已正式落地實施。在業界實踐中，已有廣東國企成功完成大灣區內相關跨境標準合同備案，為大灣區醫療數據的跨境使用提供了堅實的合規保障。同時，前海也啟動了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積極拓展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

然而，機遇背後亦潛藏不可忽視的法律與安全風險。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下，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仍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制度與標準的不銜接。

粵港澳三地在數據分類分級、安全評估及轉移標準上存在明顯差異，尚未形成統一的執行標準，無形中加劇了企業的合規與監管壓力。其次，碎片化的監管模式導致權責邊界不清，協同監管立法的滯後使得數據本地儲存、境外託管等複雜場景缺乏詳細的法律指引。最後，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凸顯。數據在跨境流轉中不僅面臨洩露、篡改的技術風險，在地緣政治博弈激烈的今天，更可能遭遇部分西方國家以所謂「合法性」實施的域外「長臂管轄」（如美國的相關數據法案），直接對我國國家數據主權構成威脅。

依託北都打造數據互通高地

破解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困局，應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進行頂層設計。北部都會區（北都）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被明確定位為創科產業融合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的重要戰略載體，更是建設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今年九月公布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明確提出，要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安排，健全數據跨境管理機制，並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治理。

同時，2026年施政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積極促進科研人員、數據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之間高效便利、安全流動；並支持在前海建設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全面拓展醫療、金融、教育等領域的數據深度合作。

為落實上述戰略願景，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着手，妥善統籌數據流動與國家安全：

第一，在北都探索粵港澳數據標準協同機制。建議匯聚三地政府部門與業界資源，共同推動構建大灣區數據分類分級處理與跨境轉移的參考指引。透過明確界定涉及國家安全、經濟運行的關鍵數據清單，建立數據分級處理與轉移的動態映射機制，化解三地法規術語與標準不一的壁壘。

第二，深化大灣區數據跨境監管協同合作。加強粵港澳三地監管力量的常態化對接，逐步統籌數據風險評估與應急處置標準。推動監管信息常態化共享，實現三地監管部門的信息互通與聯合行動，以嚴密監管網絡築牢區域安全屏障，防範境外勢力利用法規漏洞實施長臂管轄。

第三，積極推動深港跨境隱私計算等前沿技術應用。針對無法透過常規便捷通道物理出境的高敏感科研與商業數據（如醫療基因、AI訓練核心語料等），鼓勵在北都創科園區內利用聯邦學習、多方安全計算等前沿技術，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與「算力過境」。這不僅能在確保核心原始數據不出域的安全前提下，支撐深港兩地開展高附加值的聯合科研與模型訓練，更能解鎖深水區的數據價值，為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能。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下，香港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依託北部都會區的戰略布局，將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底線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設施。透過法治創新與科技賦能，香港將在國家數字經濟版圖中發揮更關鍵的聯繫人作用，開創大灣區數據互聯互通的新篇章。

北京市政協委員、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一國兩制青年論壇高級研究員

團結共謀統一復興大業



吳志斌 | 焦點評論

11月12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學習繼承發揚孫中山先生寶貴精神，激勵全體中華兒女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鬥提出明確要求；呼籲兩岸同胞以及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努力。百年之前，孫中山先生振臂而起，掀起洶湧革命浪潮，發出力挽狂瀾的愛國吶喊；今日的炎黃子孫，當如何更好地傳承、接續、弘揚這份遺志？

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理想，根基是對一個統一的中國的堅定追求。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實現民族復興，正是對孫中山先生百年前矢志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革命訴求的深刻回應。筆者認為，中國近代革命的初心，本就根植於謀求國家統一的追求；「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則為新時代推進振興中華偉業，提供了切合國情的獨特制度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一定能夠實現！回望歷史，孫中山一生奔走，發聲革命，為的是一國統一，為的是民族獨立和自由——正如他所言，「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麼樣愛國。」港澳順利回歸、「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為我們探索祖國和平統一之路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堅實基礎。

港澳回歸二十多年來，發展成果舉世矚目。香港長期位居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列，創新科技持續突破，航空貨運量穩居全球第一，也是國際備受信賴的爭議解決樞紐。澳門經濟穩健發展，民生持續改善，人均生產總值表現亮眼。事實充分證明，「一國」不是對地方發展的約束，而是維護繁榮穩定的安全底線；「兩制」亦非發展桎梏，而是充分尊重地方實際、釋放港澳獨特優勢的制度安排。「一國兩制」展現的強大生命力與示範價值，對推進祖國統一進程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對此，我們必須深化對「一國兩制」內涵的認識與把握。

回顧香港回歸以來的治理經驗，歷史啟示我們：**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底線不容模糊，這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基石。其次，「愛國者治港」原則解決了誰來治理的問題，特區政府的治理權、管治權必須牢牢地掌握在認同國家、承擔憲制責任的人手中。最後，「一國兩制」的衡量標準是民眾的認同，是民生的提升，更是民心的所向**。在未來，「兩制」的方案若要在台灣實施，筆者認為，統一後的台灣治理，並非「兩制」落地之後才單純鋪排政策。國家安全、制度銜接、社會整合三者三位一體、緊密相連。特別是，台灣長期受島內分裂活動與外部勢力干預的侵擾，治理環境錯綜複雜、挑戰重重。因此，必須牢牢把握「一國」作為治理的制度底線，更要在解決「兩制」差異之前，提前回答「如何防止分裂勢力復燃」，「如何阻斷外部勢力以經貿、文化、媒體之名介入」，「如何讓社會秩序平穩過渡」等現實課題，實現在統一的治理安排上，做到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平衡。

孫中山先生曾說，「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160年過去，這句話既回響在人民大會堂的紀念講話之中，也體現在港澳「一國兩制」的豐碩實踐之上，更必將激勵兩岸中華兒女同心同向，共擔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重任。

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僑聯委員、資深評論員

繼承孫中山「振興中華」偉大理想



陳克勤 | 議事廳

202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深切緬懷孫中山先生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勳，並就學習繼承發揚孫中山先生寶貴精神提出明確要求，呼籲兩岸同胞以及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努力。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他所提出的「振興中華」、「國家統一」的呼聲穿越百多年歷史，在當今時代依然鏗鏘。值此之際，我們更要思考，香港應如何傳承這份精神，在新時代、新征程的背景下，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從歷史上看，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香港孕育，他的革命事業也同香港聯繫緊密。可以說，香港是孫中山先生愛國主義思想的重要發源地，亦是早期愛國革命運動的重要策源地，我們要用好孫中山史跡徑、中山紀念公園等歷史遺蹟，將珍貴的愛國歷史轉化為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課堂，推動愛國愛港精神的傳承。

香港亦傳承和實踐了孫中山先生的寶貴精神財富。一方面，香港傳承愛國主義精神，始終堅持愛國愛港的核心，以「振興中華」為己任。正如習主席強調，孫中山先生一生愛國救國，我們學習、繼承、發揚他的寶貴精神，就要高揚愛國主義精神、奮力實現祖國繁榮富強。當前，國家正處於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階段。香港的愛國主義不僅僅停留在精神層面，更應該扎實的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繁榮發展集中香港智慧、貢獻香港力量。我們要更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創新科技發展，善用專業服務和國際網絡，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聯通內外的作用，同時為香港開拓新的增長空間。

另一方面，香港是「國家統一」的當代實踐者，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習主席指出，孫中山先生始終強調「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疾呼「『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他對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和堅定意志，一直啟迪、教育、鼓舞着全體中華兒女，香港亦是這一精神的堅定實踐者、擁護者。1997年，香港以「一國兩制」率先垂範，承擔起推動國家統一的歷史重任；2019年，反中亂港勢力內外勾結、試圖分裂國家，香港始終堅持原則底線；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由亂到治、由治及興，「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面向未來，香港將繼續傳承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弘揚以愛國愛港為核心、與「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值觀，不斷增強國家認同、自覺維護國家統一**。

回望歷史，孫中山先生一生同香港關係密切，其對香港的影響意義深遠。在當今時代，傳承與實踐先生「振興中華」「國家統一」的偉大理想，要始終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築牢安全防線；亦要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貢獻香港力量。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